

休谟思想研究

阎吉达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休谟思想研究

阎吉达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114号

休谟思想研究

阎吉达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437,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514-190-8/B·20 定价: 18.00 元

序 言

刘放桐 俞吾金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厚厚的著作是阎吉达同志在完成了《贝克莱思想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后撰写的又一部力作。阎吉达同志长期以来从事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深入地把握英国经验论哲学演化的脉络,他研究的视野从不囿于一隅,而是扩展至整个西方哲学史,对从古希腊哲学至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了然于心,然后由博返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研英国经验论哲学,其见解见诸于文字,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宛然成一家之言,屡屡得到同道的好评。

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的话,那末,英国经验论哲学则是这一宝库中最引人注目的藏宝柜之一,而在这个藏宝柜中,休谟的思想犹如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发射出耀眼的光芒。记得怀特海曾把全部西方哲学看作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而雅斯贝尔斯则干脆把那个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仿佛以后时代的哲学家就像詹姆士笔下的那只松鼠,只知道围绕一棵树而不停地奔跑下去。这里显然有着夸张的热情。平心而论,西方哲学史是由一连串大思想家的名字构成的,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谁又能谈论哲学史而把这些名字撇在一边呢?在这一连串名字中,休谟是特别令人瞩目的,这不仅因为休谟是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就像黑格尔

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一样，而且休谟以无比明晰透彻的思路把整个经验论哲学引向极端，从而也为以后哲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这不仅因为休谟以怀疑论者的姿态审视了传统哲学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否定，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础，使同时代的一大批哲学家陷入迷茫和恐慌之中。那种情形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席勒笔下的华伦斯坦公爵夫人的担忧：

哦，我的丈夫！你总是在营造营造，
已经高出了云表，依然在想更高更高，
全不念到这狭隘的地基不能支持
那眩晕飘摇的营造。

休谟的怀疑主义不仅把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式的温馨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从而影响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且也肇始于孔德的现、当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和滥觞于罗素、维特根斯坦、摩尔等人的语言哲学打开了思路。休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记得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通向哲学本身，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休谟。

然而，更愿意沉湎于直觉和思辨中的中国哲学界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对英国经验论哲学，尤其是休谟哲学的漠视。要明了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的出版物就行了。对休谟研究的第一手、第二手的资料的翻译是如此之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又是如此之少，这和休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根据目前已有的中文资料，很难完整地勾勒出休谟的整个理论形象。在这种情形下，阎吉达同志的这部专著的出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专著虽然篇幅较大，但读来却无松散冗长的感觉，反倒留下了这样一个很深的印象，即它是作者一气呵成的。作者撰写它虽历经数载，但它似乎是一个突然降生的婴儿，显示出整体的生命感。至少在以下这些方面，这部专著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

示。

第一，倡导了对重要哲学家进行全面的个案研究的方法，胡适认为，研究哲学要臻于既能拿斧头又能拿绣花针的境界是很困难的。所谓“拿斧头”，就是从大处着眼，对整个哲学史了然于胸，并能作出肯切的批评；所谓“拿绣花针”，就是从小处着眼，能对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个哲学问题，作出细致深入的分析。胡适自己治学，既能“拿斧头”，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又能“拿绣花针”，撰写《章实斋先生年谱》和《戴东原的哲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拿斧头者”居多而“拿绣花针者”偏少。诚然，当我们在欣赏一幅画时，从总体上把握这幅画的结构是必要的，然而，对它的细节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忽视了图画细节，我们对整体画面的领悟也必然会失之浮泛和粗浅。在今天，如何进一步深化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对重要的哲学家进行全面的个案的研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阎吉达同志的这部专著对休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既集矢于休谟的基本哲学思想，又广泛涉及他的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学说，使读者对休谟的整个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事实上，不了解休谟的其他思想，也不可能对他的哲学思想有透彻的领会，因为一方面，休谟对其他学问的研究都是以其哲学思想作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其他学问的研究又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阎吉达同志对休谟的研究，不光涉及到他的全部学说，而且涉及到他的性格、气质和整个生活经历。他在爱丁堡大学的中途辍学和孜孜不倦的自学生涯，他谋取教授职务的多次失利和生活上的一度困厄，他在《人性论》出版上的挫折和追求真理的无限勇气，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真知灼见和在获取巨大成功后表现出来的庸人气息，他的独身和对社交的广泛兴趣，他对卢梭的真诚和因卢梭的忘恩负义而引起的巨大的痛苦和愤慨……，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经历和轶事，连同休谟的学说一起，向读

者展示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哲学家的形象。写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萨特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所倡导的“前进—逆溯”的方法。按照这一方法，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揭示出历史人物生活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阶级归属，而且要揭示出他们生活中的“微分”和种种偶然的事件，以便完整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光彩。阎吉达同志的专著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第二，把对休谟的研究和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阎吉达同志从不把休谟看作一个游离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抽象的和自我封闭的点来进行研究，他既注重对休谟本人思想的考察；又主张把休谟的全部思想放在历史的流变中来剖析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和历史地位。比如，在分析休谟关于两种知识的理论时，作者既分析了休谟的先行者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等人的知识理论对休谟的影响；又论述了休谟的知识理论对康德、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等人的巨大影响。又如，在论述休谟的伦理思想时，作者对它和霍布斯、卡德沃思、坎伯兰、洛克、克拉克、莎夫茨伯利、曼德维尔、哈奇森、巴特勒、贝克莱等人的伦理思想作了类比研究，从而清楚地展示了休谟伦理思想的起源、本质和热点问题，使读者对其伦理学说在整个西方伦理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这种论述方法历史感强，分析透彻，说理细致，极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对休谟思想的评价注重科学性，不作蹈空之论。在以往的休谟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从当时英国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简单地去评价休谟哲学的倾向。阎吉达同志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必然导致对休谟研究的误导。他主张，对休谟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思想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要作出历史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要防止简单化。在深入钻研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许多哲学史家

(包括我国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教科书)都认为《人性论》是休谟在法国完成的,阎吉达同志通过对休谟书信的深入研究,指出《人性论》中的“论知性”和“论情感”的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而“道德学”则是在休谟返回英国后完成的,从而纠正了史家的一个错误。在对休谟各方面思想的评价中,这部专著不但切中肯綮,而且多有新见,从中可以见出作者深厚的功底和学术上的涵养。

综上所述,对于有志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同道来说,阎吉达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值得一读的。当前,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能坐住“冷板凳”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愈来愈少了。然而历史早已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的真正繁荣是离不开学术和思想的助力的。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问世,为我们的现代化营造一种高雅的、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精神氛围。

是为序。

绪 论

休谟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英国近代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近代西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当代西方经验论派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而又重要的思想影响。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均为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当代经验论派所继承。因此，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然主义哲学家塞拉斯(Roy Wood Sellars, 1880—1973)曾这样说过：“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就是休谟的那一套观点。”^①另一位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也曾说过：“在理论方面，我不认为我们今天比休谟遗留给我们的前进了多少。”^②休谟的哲学不仅同当代西方经验论派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他带有“破坏”性地对经验论原则的彻底贯彻，也促成了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因此，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195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中便声称：“整个十九世纪内，以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③

无疑，正是由于认识到休谟的哲学思想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发

① 涂纪亮编：《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第1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8页。

② 转引自江天骥：《归纳逻辑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1页。

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各国哲学界多年来一向高度重视休谟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著作，不断地开展深入的研究活动。在西方各国，研究休谟的论著，其数量之多，恐怕是研究其他近代哲学家的论著很少能够比拟的。

在我国哲学界，休谟也一向由于其在哲学发展史上所处的上述重要地位，而成为人们所熟知、并被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位近代英国哲学家。当然，我们对他感兴趣，还因为他不仅是狭隘经验论的典型代表，而且也是当代西方广泛流行的所谓反“形而上学”思潮的主要先驱。情况虽然如此，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休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在刊物上有时也会看到一些研究休谟思想的论文发表，但至今却尚未见到对休谟的哲学思想作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的专著问世。这种状况固然有着一定的原因，但总归是不正常的。一来，它碍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二来，也不利于我们对包括怀疑论、不可知论和狭隘经验论在内的休谟哲学思想获得深入而又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能否以翻译出版国外有关对休谟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论著，来代替我们对休谟思想的研究呢？不能。因为对于每每自称求助于所谓“经验和观察”而建立起来的休谟的哲学思想，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深入开展研究，是很难能真正科学地加以理解和评述的。

二

同近代出现于西欧地区的其他哲学家相比，休谟的哲学外表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便是：它对于当时各派哲学就一些共同关心或共同涉及的基本问题所提出的看法，均持不置可否的怀疑态度。如在实体问题上，它既不肯定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物质实体的真实存在，又不肯定神学唯心主义者所主张的精神实体的真实

存在。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它认为既无法论定感觉源于外界物质性对象对人的感官的作用，又无法论定感觉源于上帝对人的感官的作用。再如，在因果性问题上，它认为既无法肯定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因果联系的真实存在，又无法肯定神学唯心主义者所主张的因果联系的真实存在。

在休谟看来，他对当时各派哲学所普遍关心和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持不置可否的怀疑态度，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在认识上是无法弄清的。如在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各种实体的真实存在时，他便声称，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是否真实存在，这是无法从认识上作出判断的。因为“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物就是知觉”^①；我们“不能清楚地想象，对象就其本性而论，除了恰恰就是知觉而外，还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②。又如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在既不同意唯物主义的回答方式、又不同意神学唯心主义的回答方式时，他便写道：“由感官所发生的那些印象，据我看来，它们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解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实地断定，那些印象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能力所产生，还是由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得来的。”^③ 上面的引文出自《人性论》。在后来出版的《人类理智研究》中，休谟则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我们借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定是由和它们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所引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人心的力量生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一种无形而不可知的精神的暗示生起呢？我们凭什么论证来证明它们不能由更难知晓的一种别的原因生起呢？”^④ 也就是说，休谟的怀疑论是完全立于他的不可知论之上的。

①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239页。

② 休谟：《人性论》，第245页。

③ 休谟：《人性论》，第101页。

④ 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下同），第135页。

作为其怀疑论的理论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产生根源是多方面的。这同他在认识论中排斥实践活动的做法有关，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另外，也同受他之前的牛顿、洛克和贝克莱等人的不可知论思想的影响有关，但最为根本的原因似乎还是在于，休谟在关于实际事物的认识问题上，坚持只要感觉经验、而一概弃拒理性思维的狭隘经验论立场。

休谟坚持狭隘的经验论立场，这固然在根本上取决于他在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下，不懂得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的辩证联系，不懂得感性认识活动和理性认识活动的辩证联系；但也有重要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来源。随着实验自然科学在近代英国富有成果地不断发展，同经验相联系的实验和观察的方法，在英国社会上也被公认为认识自然的唯一科学方法。然而，这一为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却被英国哲学家们绝对化了，使之成为一种到处普遍适用的认识方法。在这方面，集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牛顿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光学》一书的结束部分，牛顿便曾倡议把观察实验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精神科学”之中。牛顿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所提出的上述主张和号召为不少人所接受，其中也包括休谟。这直接体现在休谟为自己的第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性论》所加的副标题上。该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休谟不仅通过这一做法，也不仅通过他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精神科学”所作的具体研究，体现了他试图把观察实验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移到“精神科学”中来，而且他也十分自信，认为通过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中彻底运用牛顿所倡导的观察实验的方法，一定可以取得“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胜利，最终促使“精神科学”领域也发生一场类似于由牛顿所导致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巨大变革。也正因为如此，早在写作《人性论》时，休谟便相信自己会成为哲学和道德学等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牛顿。

问题当然主要不在于把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移到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来,而是在于,对所谓的观察实验方法作何理解。如果认识到这一方法自身,不仅包含着感性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抽象的理性思维方面的认识活动,那么,把这一认识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移用到人文科学领域,也未尝不可。可是,牛顿本人却主要从感性认识方面,去看待他意欲推广的观察实验方法的实质和内容。他认为,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限于直接所获得的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或限于直接可感的现象的范围之内。他说,“凡不是从现象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并称他本人在各门学科领域,从“不作任何假说”^①。对于曾给自己带来辉煌成就的观察实验的方法,牛顿的理解体现出狭隘经验论立场,这对休谟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休谟不仅也同牛顿一样,主张人的认识只是限于现象界,而且还声称,自己对问题的研究,“只依据经验得出结论”,并说自己也只是“轻蔑地谈到假说”^②。

牛顿对休谟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狭隘经验论方面,对休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并不是牛顿,而是洛克。洛克前后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哲学巨著《人类理智论》,在当时的英国和整个西欧地区影响深远,该书在对起源于感觉经验的人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系统总结的同时,也往往用狭隘经验论的观点,来回答和论述哲学领域中的一些为各派哲学普遍关心的问题。

当然,不论是牛顿,还是洛克,甚至对休谟也有较大思想影响的贝克莱,之所以在哲学认识论上都坚持狭隘经验论的立场,最终主要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所发展出的人们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决定的。

① H. S. 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页。

② 见本书附录,休谟:《(人性论)概要》。

虽然在探究休谟的不可知论思想的根源时,我们发现休谟的狭隘经验论,与牛顿、洛克,甚至贝克莱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比较起来,休谟的狭隘经验论,较其前驱思想家的狭隘经验论,在性质上更要严重得多。这突出地表现在,休谟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宣称,在有关对实际事物的认识上,起作用的只是感觉经验,而没有理性思维的参与,明确地把人的一切认识完全限制在现象界的范围内;而且拒不承认长期以来为各派哲学所使用的诸如实体观念、因果联系观念、自由与必然观念等的真实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观念不可能源自感觉经验。正如许多后人所说,休谟接受了前人的“经验论原则”,而又着力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①。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休谟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所以他的哲学最终成为远离人类生活的实际和认识活动的实际,以致不免遭到来自各方的责难和非议,但尽管如此,他却坚持这样做下去。这是由于,第一,休谟认为,只有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一切听凭于感觉经验,才能把传统的、非科学的哲学改造为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在休谟看来,洛克等前人的哲学,之所以有种种缺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把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第二,休谟认为,只有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从而对历来为各派哲学和宗教神学所使用的诸如各种实体观念、因果联系观念和自由与必然等的观念,进行一番清理和改造,才能消除长期存在于哲学和宗教神学领域的各种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总之,在休谟本人看来,他在经验论基础上提出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其意义完全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应该承认,休谟对问题的考虑或持有的看法,出发点是真诚而又善良的。然而由于他深陷狭隘经验论的泥坑,缺少辩证的思维方法,所以他对问题所持的具体想法或看法是不可能正确的。他的哲学思想的提出,他对主要源于洛克的经验论原则的彻底

^① 如黑格尔便说过:“休谟接受了洛克的经验原则,而把它进一步贯彻到底。”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阿),第209页。

贯彻，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积极意义并不表现为他所认为的上述两方面，而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休谟在怀疑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外界物质性事物真实存在，怀疑在外界事物之间存在真实的因果联系的同时，也对宗教神学所主张的精神性的上帝和心灵的真实存在说，及其所具有的对其他物的作用说的真实性，予以怀疑。而且从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怀疑重点正是后一方面，而不是前一方面。因此，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具有某种进步作用，即针对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的思想解放的传统的宗教神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具有较强烈的反宗教神学的色彩，才使他一辈子都没有能摆脱来自宗教神学方面的势力的纠缠和迫害。

其次，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哲学，对洛克的经验论原则的彻底贯彻，也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和认识英国近代经验论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归宿。休谟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结果，是在对各种实体的真实存在、对唯物主义者和神学唯心主义者各自主张的因果联系的真实存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只明确承认呈现于人们感官前的各种知觉(感觉)的真实存在。这样一来，整个世界也就被说成是一个由各种知觉构成的虚幻世界。如此荒谬地论述问题和看待问题，表面看来，只是休谟个人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它应被看作是英国近代经验论所信奉的经验论原则，通过休谟这个具体人物的彻底贯彻，所必然要导致的逻辑结局。英国的近代经验论哲学，由于承认人的认识源于感觉经验，加之洛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了起源于感觉经验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不仅在英国较为流行，而且在西欧大陆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欢迎。但是这一哲学发展下去的逻辑结局，一旦通过休谟而被揭示出来之后，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开始怀疑主要由洛克的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经验论原则的正确性。与休谟处于同一时代的苏格兰常识学派领袖人物托马斯·里

德(Thomas Reid, 1710—1790)在给休谟的一封信中,便直率地表达了上述看法。在信中,里德赞扬休谟的哲学体系“各部分连贯一致”,并指出休谟的观点和原则,是从洛克的哲学中“推演出来”的,同时又声称,休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外界物质性事物的真实存在的怀疑,使他开始怀疑起被他称之为“观念的理论”的洛克的经验论原则的“正确性”。^①当然,曾对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洛克的经验论,并没因为休谟而完全失去它的影响,或完全被人们抛在一边。但休谟因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最后陷入无法再往前进的死胡同的境地一事,至少向人们表明:洛克的哲学所代表的英国近代经验论具有狭隘经验论性质,如果这一哲学的追随者将其彻底贯彻下去,完全否弃理性思维的认识作用,那它就决计不能摆脱休谟业已陷入的困境。大约正是由于休谟哲学的教训,西欧各国接受洛克的经验论思想影响的人至少在十八世纪期间,基本上没有像休谟那样坚持极端狭隘经验论立场,而重犯休谟式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

再有,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提出,在当时和以后对于西欧地区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于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者康德就承认,他之所以能够从在德国思想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色彩浓厚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开始新的哲学研究活动,正由于受到了休谟对传统的因果性学说所持的怀疑论态度的“提示”。黑格尔也很看重休谟的怀疑论对康德建立批判哲学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曾说:休谟的“怀疑论在历史上所受到的重视,有过于它本身的价值。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真正说来,康德哲学是以它为出发点的。”^②休谟以怀疑论为思想武器所开展的反对

① 转见科普尔斯顿:《哲学史》第5卷,伦敦1964年英文版,第365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3—204页。

传统的宗教神学的斗争,对同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无疑也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和鼓舞作用,以至于爱尔维修等人,不满足于休谟已出版的有关批判宗教神学的著作,而要求休谟能再多贡献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在当代,休谟用来批判宗教神学的怀疑论方法,也不断地为人们所接受。如上个世纪的英国的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都追随休谟,认为上帝的存在在理论上或认识上是无法加以肯定的。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于作一个不可知论者。”^① 罗素则称:“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条,即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中是找不到根据的。”^②

三

休谟虽然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位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作为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思想方面的成就,又远远不限于哲学领域。事实上,在哲学以外的人文科学的各主要领域,如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中,他都写有一定数量的专著和大量的专题论文,对各种问题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阐述。其思想在近代西方有关学科的发展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在政治学领域,他曾对近代在西欧地区一度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批判。在经济学领域,他依据自己所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批判了有碍于自由贸易发展的重商主义,这对推动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实际意义的。另外,他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其密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也有着

① 转见〔英〕F. 达尔文编:《达尔文生平》,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② 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